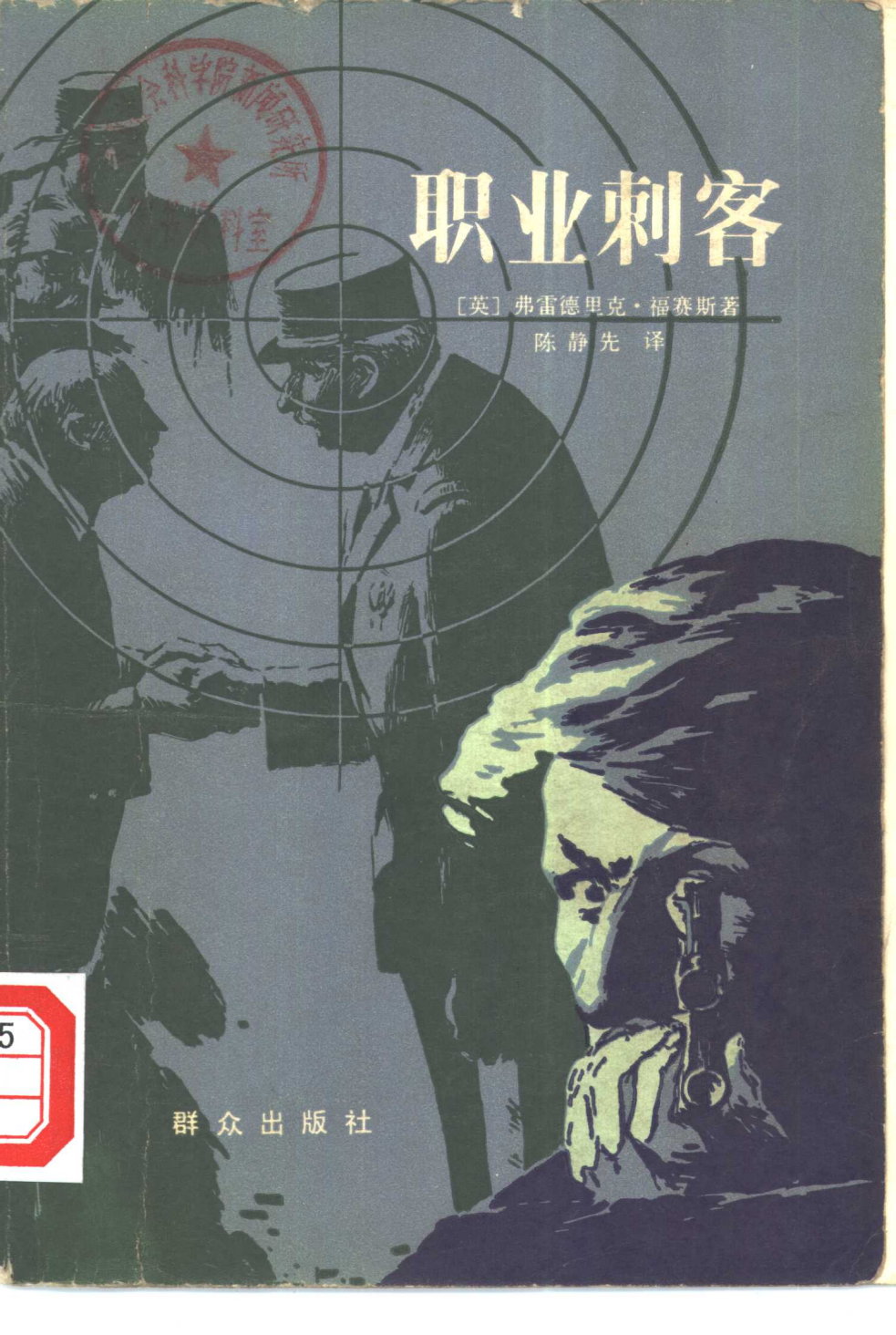




职业刺客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著

陈静先译

群众出版社

5

职业刺客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著

陈静先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北京

THE DAY OF THE JACKAL

Frederick Forsyth

Published by Bantam Books, Inc, 1972

根据纽约彭坦图书公司 1972年版译出

职业刺客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69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80000册 定价：1.00元

内 容 简 介

六十年代初，法国政府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国内资产阶级右翼对戴高乐政权极为不满。作者根据这一背景，虚构了“秘密军队组织”



作者像

谋刺戴高乐总统这一情节。故事开头叙述了“秘密军队组织”在多次谋刺失败以后，决定雇用外国职业刺客，故事遂逐渐展开。法国政府在英国警察当局的密切配合下，根据英国提供的情报，全力兜捕，最后终于在行刺的现场把刺客击毙。

作者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是英国记者，《职业刺客》原名为《豺狼的末日》(The Day of the Jackal) 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第一部 策 划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这一天清晨六点四十分，巴黎的天气很冷，这时候有一个人将被行刑处决，似乎觉得天气更冷了。在巴黎郊区的伊弗雷堡，有一个法国空军中校被反绑着双手站在木桩前面，他用一种正在慢慢消逝的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站在二十米外的一队士兵。

他用一只脚踢开地上的砂砾，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神情。这时他的眼睛被黑布蒙住了。他是三十五岁的让-马里·巴斯兴-梯莱中校。有一个传教士站在旁边嘴里念念有词，这和二十支步枪的子弹上膛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高墙外面，传来了一辆向市区飞驰的汽车的喇叭声，掩盖了执行官发出的“瞄准”的口令。枪声响了，对这个正在醒来的城市来说，表面上似乎没有引起波动，只惊动了一群鸽子飞向天空，枪声的余音，也在从墙外传来的车辆往来声音中消失了。

被处决的那个军官是“秘密军队组织”OAS的领导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谋刺法国总统。他的死，应该说法国总统的生命已经不至于再有危险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仅仅标志着事件的开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先追述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清晨，在巴黎郊区的军事监狱的院子里，要枪决这个人。

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夏天的巴黎，当夕阳落到宫墙的后面，在宫前广场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感到可以喘一口气。在每年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到傍晚七点

钟，气温仍达摄氏25度。每到周末的时候，妇女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搭汽车或火车到乡间去。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有几个人在巴黎近郊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他们认为在这一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生命即将终止了。

正当城市居民准备到郊区较为凉爽的河滩地以躲避市内的酷暑时，爱丽舍宫的内阁会议仍在紧张地进行中。在广场前面的树荫下，有十六辆黑色大轿车首尾相接连成一圈地停着。汽车的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连续不断地相互开着玩笑，等待着汽车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好象有说不完的互相埋怨，时间拖得特别长。直到七点三十分，才看见一个胸前挂着证章的传达员出现在玻璃大门的后面，他向门外的警卫做了个手势。汽车司机们就纷纷站了起来，吸烟的人把未吸完的烟头扔在地上走向汽车。在大门外的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们都振作起精神。

大门打开了。当第一批部长们出现在玻璃大门后面的时候，汽车司机们已手扶方向盘做好准备工作。内阁部长们慢慢走下石阶，互相告别后，这些大轿车有顺序地驶到石阶前面，侍从官一个个打开车门，鞠着躬，请部长们上车。汽车陆续通过敬着礼的国家警卫面前，驶向通往市郊的大道。

仅仅十分钟，部长们都离开了。这时留在广场上两辆长的黑色DS19型轿车，开始缓慢地驶向石阶前面。第一辆是挂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三角形小旗的汽车，驾驶员名叫法朗索瓦·马鲁。他原来是国家宪兵训练司令部的警察司机，沉默寡言，从不在休息时和其他司机开玩笑，他头脑冷静，有安全快速驾驶汽车的技能，因而成为戴高乐的私人汽车司机。

除掉马鲁，别人不驾驶这辆汽车。在他后面的那辆 DS19 型轿车的驾驶员也是一个宪兵。

七点四十五分，当另一群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时，警卫人员显得更紧张了。夏尔·戴高乐总统照常穿着他那身深灰色双排钮扣的便服，系着黑色领带出现了。按照传统习惯，他让戴高乐夫人先出来，然后挽着她的手臂扶着她走下石阶，走到汽车前他们才分开。总统夫人在汽车后座的左边就坐，总统自己则坐在右边。

他们的女婿，阿伦·特勃阿苏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车门后，才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上。

另外两个保卫人员保卫着总统和夫人走下石阶后，乘坐后面那辆轿车。他们是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亨利·特儒台和从阿尔及利亚来的卡皮勒。特儒台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光，并不注意前面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最后一个人嘱咐了守卫人员几句话后，进入后座，他是总统保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着白盔的人驾驶着摩托车并排着停在大门边，他们保持着十尺间隔，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开动后，他紧跟前面的两辆摩托车，第二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这时是七点五十分。

这个小车队驶入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里尼大道。在道边的栎树下，有一个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后，他也驾驶一辆小摩托车在一定的距离后面跟踪前进。八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一切如常。总统的出行事先也未通知，只有当

值班交警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车队的来到，急忙停止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大道上加快了速度，穿过克勒孟苏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驾驶小摩托车的人紧紧跟随。马鲁跟着前面的两辆摩托车进入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入宽阔的英凡立特林荫大道。到此时，后面驾驶小摩托车的青年确认戴高乐的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一家咖啡馆。在那里，他利用公用电话，拨通了一次本市的电话。

这时，巴斯兴-梯雷中校等候在巴黎近郊。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根据他的职业和家庭生活背景，他对戴高乐有很深的憎恨。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出卖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从而使他重获政权。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他并未遭受什么损失。因此可以说他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贞。在这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象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人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兴-梯莱就是这样的人。

他那时正在一个酒吧间里喝啤酒。电话铃响了，侍者把电话机交给他后，就自己看电视节目去了。巴斯兴-梯莱接过电话听了几秒钟，轻轻地说了一句：“很好，谢谢你。”就放下电话机。他的啤酒钱是先付了的。他立即走出酒吧间到了人行道上，手持一份报纸并小心地卷了起来。

在大街对面一幢公寓的楼上，一个青年妇女放下了窗帘，对屋内的十二个人说：“是第二号路线。”有五个毫无经验的青年人，突然跳了起来。其余七个年龄较大的却并不这样激动。他们中间有指挥这次暗杀行动的第二号人物，名叫阿兰·布格勒内，是一个出身于有产者家庭的极右分子，他也是三十五岁，也已结婚，有两个孩子。

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名叫乔治·瓦当，年龄三十九岁，是个宽肩大个儿的“秘密军队组织”的狂热者。他原来是在阿尔及利亚当一名农业技师，两年前加入“秘密军队组织”，是一个危险的射击手。由于他腿部曾受过伤，他的外号叫“拐子”。

当这个年青妇女宣布这个消息后，所有十二个人都从屋后的楼梯下楼到了小街上，在那里停了六辆汽车，都是偷来的或者租来的。当时的时间是傍晚七点五十五分。

在这以前，巴斯兴-梯莱曾花了几天时间亲自策划这个谋刺地点。他测量了射击角度，估算了快速行驶中汽车的速度和距离，还准备了足以停止车队行进的火力配备。他选择的地点是在长而且直的解放大道上，前面就是小克拉玛区的十字路口。他的计划是安排第一组射击手在十字路口二百米处向总统的汽车开火，他们都躲藏在路旁的蓬车内，要求射击的角度比较小。

根据巴斯兴-梯莱的计划，第二组射击手从小路出来把警卫人员的汽车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在一起解决总统乘坐的汽车。成功后逃上停在小路上的汽车逃走。

八点零五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手已经守候在各自的岗位上。巴斯兴-梯莱亲自担任瞭望员，他站在离射击地点向

巴黎方向约一百米处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手里拿着报纸。约定的信号是：他挥动报纸就是通知躲在蓬车里第一组组长赛格·贝尔尼，转告后面的汽车司机布格勒内把汽车驶向第二辆汽车。由拐子瓦当用机枪扫射。

戴高乐总统的车队离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街道进入较宽的近郊大道，车速已接近每小时六十英里。司机马鲁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知道坐在他后面那位老将军的急性子，就把车速再加快了一些。两辆摩托车落到车队的后面了。戴高乐总统从来就不喜欢这种排场，只要有机会，他就乐于让他们离开。

正在担任瞭望的巴斯兴-梯莱这时还不知道他已经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他在被捕一个月后才明白过来的。为了确定谋刺总统的时刻表，他曾做过一番调查。他从天文历书上查到，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到八点三十五分天才暗下来。即使戴高乐总统比他习惯的时刻表再晚一些，也还来得及。但这位空军中校查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天文历书，没料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八点十分的时候天就暗下来了。这重要的二十五分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当那天八点十八分巴斯兴-梯莱发觉总统的车队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进入解放大道时，他急忙挥动他手中的报纸。

在一百米以外，贝尔尼焦急地注视着公共汽车站旁边站着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自言自语地问：“中校挥动了他的报纸没有？”他的语音未落，突然看到总统那辆汽车已经飞驰过那个公共汽车站。他大叫一声：“开火！”这时射击手们已经只能以直角的角度向着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在他们面前驶过的汽车射击。

射击的技术还是很高明的，使总统的汽车中了十二发子弹。较多的子弹落在汽车后面。总统的汽车有两个轮胎被射中了。虽然这些轮胎能在中弹后自动密封，但突然的漏气足以使汽车向一侧倾斜，在地面上滑行。这时，司机马鲁不顾一切继续向前行驶救了总统的性命。

这时另一个射击手又射中了轮胎，其余的人则向汽车的后窗扫射，几粒子弹射中车身，一粒子弹射进后窗，在离总统的鼻尖数寸处穿过。坐在前面的勃阿苏上校高喊“趴下！”总统夫人把头伏在丈夫的膝盖上。这位老将军扭转身子望着后窗叫道：“什么，又来了！”

马鲁紧握方向盘，让汽车滑行了一段，同时急忙变换排挡。当汽车稍稍稳定后，再度向前驶向杜布阿路口，那里正是第二组射击手埋伏的地方。后面这辆汽车则没有中弹，紧紧地尾随前进。

“为什么不还击，这批白痴！”戴高乐生气了。保卫人员特儒台原打算对准十尺以外的射击手开枪，但是汽车司机遮住了他的视线。总统保卫队长杜克勒要司机紧跟总统的汽车，几秒钟后，他把布格勒内的汽车抛在后面了。那两辆摩托车也随后跟了上来。这样，总统的车队通过十字路口，向郊外驶去了。

那些在埋伏地点的“秘密军队组织”的谋刺者们来不及互相埋怨，急忙离开原来的汽车，跳上预先停在路旁准备逃跑的汽车，消逝在黑暗之中。

保卫队长杜克勒利用车上的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当他们十分钟后到达那儿时，戴高乐命令把汽车开到直升飞机旁边。汽车停下来后，一批官

员围了上来，车门打开了。总统夫人先下车，总统把膝盖上的玻璃碎屑抖掉，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他不顾站在旁边慌了神的官员们，绕过汽车去挽住夫人的手。

“来，我们回家去吧！”总统对夫人说。他又对那些空军人员们评述着这次“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他们从直角的角度射击，这是错误的。”然后他扶着他的夫人上了直升飞机，坐在她旁边。特儒台也上去了。他们打算在乡间度过周末。

到这时，法朗索瓦·马鲁还心有余悸，脸色灰白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汽车右边的两只轮胎已被打掉，最后汽车是依靠轮圈前进的。杜克勒暗自庆幸，没有出大乱子。接着就去处理那些必须进行的工作了。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打听这桩谋刺事件，由于缺乏报道资料，只好在报上发表他们的推测。法国警方则以巴黎警察局为首，加上特工人员和宪兵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工作，接着进行了搜捕。这是仅次于以后将发生的另一次谋刺案的搜捕的规模。那次谋刺案将在以后叙述，其主要人物的代号叫“豺狼”。

九月三日，他们获得了第一个线索。这和其他案件一样，是在一次常规的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在巴黎通往马赛的道路上，一个警察截获了一辆私人的小汽车，里面乘坐四个人。这几天他们已拦住了所有过路的汽车，检查每人的身份证。当检查这辆小汽车时，其中有一人拿不出身份证，说是已经遗失。警察就把他和其他三人带到瓦朗斯进行审讯。

在审讯中知道其他三人和此人无关，因为他们只是给此

人搭了便车，都释放了。警察把第四人的指纹印下来送往巴黎以便核实他自己所报的姓名。十二小时以后，巴黎答复，其人二十二岁，法国军队中的外籍义勇军的一个逃兵。他提供的姓名倒是确切的。他名叫比埃尔·丹尼斯·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市司法刑警分队。当他在休息室里等候审问时，有一个警察开玩笑问他：“小克拉玛区的事怎么样了？”

马加德耸耸肩，说：“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

警官们瞪着眼听着，速记员们一本本地记录着，马加德一连讲了八个小时，说出了参加小克拉玛事件的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九个曾经参加预谋和提供装备的人的名字，共计二十二人。大搜捕开始了。现在警方已经可以有目标地进行逮捕了。

最后只有一个人没有找到，而且到如今也还没有下落，这就是乔治·瓦当。他逃脱后据说和“秘密军队组织”的其他领袖们住在西班牙。

对于巴斯兴-梯莱、布格勒内和其他在这次行动中为首的人，审讯和控诉的准备工作是十二月份完成的。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当审判正在进行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又集中力量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法国特工人员则以牙还牙地进行了反击。在巴黎人高雅的舒适生活的背后，在所谓有教养和文化的薄膜下面，一场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地下战正在剧烈地进行着。

法国秘密机构的正式名称叫外国文件检查及反间谍局，实际就是情报局，是个特工组织。它的任务是在国外进行间

谍工作而在国内则进行反间谍工作。但有时也不能分得那么清楚。其中第一分局是专门做情报工作的，下面又分七个处，都是用字母R来排列的。R 1是情报分析处，R 2是东欧处，R 3是西欧处，R 4是非洲处，R 5是中东处，R 6是远东处，R 7是美洲和西半球处。第二分局是反间谍局，第三和第四分局合在一个办公室里，都是对付共产党的，第六分局是法国局，第七分局则是管理局。

第五分局有一个简单的名称叫行动分局。这里是对付“秘密军队组织”战斗的核心。行动分局里有上百名彪形大汉。他们的司令部设在巴黎东北部的里拉门附近莫里埃大街的一幢外表毫无特色的大厦里。这些彪形大汉大部分是科西嘉人。他们先要经受最严格的体格锻炼，然后送到萨托雷营个别进行一切破坏工作的训练。经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为小武器或徒手进行搏斗的能手。他们受训的项目还包括无线电通讯、绑架、纵火以及暗杀等。

他们中间有些只能说法语，有些则能很流利地说几种外国语。有的在國內，有的则被派到其他国家的首都。他们受权可以在行动中杀死对方而且经常是这样做的。

当“秘密军队组织”的活动逐渐加剧而且变得非常残酷的时候，局长尤金·居衣布将军放开套住这些彪形大汉们的笼头，让他们出去对付“秘密军队组织”。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混进了“秘密军队组织”，有的甚至渗透到“秘密军队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中去了。从那时起，他们提供了不少情报让别人去行动，所有会使警方不利的“秘密军队组织”在国内外采取行动的情报，都是由他们那些混在这个恐怖组织中的人提供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能把要抓的人引诱到法

国来时，他们就在国外就地干掉。很多“秘密军队组织”成员的亲戚，开始还以为这些人失踪了，但后来才明白，原来已被这个行动组织杀害了。

对于“秘密军队组织”成员来说，教训是够多的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他们被称为巴布斯，绰号叫胡子）甚于任何警方人员。在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和戴高乐政权最后斗争的时候，“秘密军队组织”活捉了七个胡子。后来发现这几个胡子都被割去鼻子和耳朵挂在电杆上。这样的斗争继续进行着，没有人知道谁是被谁折磨致死的；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下室里被杀害的。从此，这些胡子就对巴黎的特工组织惟命是从。他们在加入特工组织以前，本来就是一些黑社会里的职业打手，经常和他们的同伙们保持接触，并通过他们帮助政府干那些肮脏勾当。由于他们的这些活动，他们被称为与警察并驾齐驱的“二警察”，据说是戴高乐的左右手，由一个名叫雅克·福萨脱的人指挥，实际上并没有“二警察”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他们的活动是受命于特工组织，只干一些临时任务。

科西嘉人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是很有名的。七个胡子在阿尔及利亚被杀后，特工组织了解到一些有关他们与“秘密军队组织”之间的宿仇，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到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就帮助法国政府来对付他们的宿仇，屠杀“秘密军队组织”。而“秘密军队组织”的成员中，很多人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打起来也是残酷无比的。

在巴斯兴-梯莱和他的同伙们受审讯期间，“秘密军队组织”继续进行活动。他们这时候的指挥者是曾经在幕后参加